



# 杜邊與馬華 (新·馬)劇運

陳亮 編



由「島上夜曲」的公演想起

丘家珍 98  
}

苦幹下去

李真 101  
}

島上夜曲排演記

小亮 104  
}

回顧光輝六十年——華語戲劇史料展覽簡介

曉山 110  
}

邵氏第一部華語影片——《新加坡之歌》

(蔡先生談話) 117  
}

「新加坡平民學校」與「海鷗」演出《萬世師表》

118A  
}

劇本：《明天的太陽》(九二年修改本)

杜邊 120  
}

杜邊作品編目(新、馬發表、出版、演出部分)

杜邊在新、馬期間導演過的劇目

175

118B

118

116

109

103

100

# 前言

陳亮

杜邊致力於馬華（新、馬）劇運，早在三十年代華僑抗日救亡運動之前就開始了。我能有機緣和杜邊一起從事馬華劇運的活動，是日本投降後的新加坡劇運蓬勃發展時期。戰後活躍於新加坡劇壇的《新加坡海鷗劇團》就是在這個時刻誕生的。當時我和肖敏、洪流等人負責「海鷗」的團務，杜邊是「海鷗」主要的負責人兼總編導。雖然我和他相處的時間只有短短的幾年，（一九四五—一九四八）但「海鷗」的日日夜夜，同甘共苦，忘我工作的情誼，却把杜邊和我以及「海鷗」的全體伙伴焊成難解難分的一族。當時「海鷗」的每個成員都有自己的職業，白天都在自己的單位裏做好各人的工作，下班後，却被「海鷗」集體所創的藝術魅力吸引到排練廳來，分頭為各處的演出工作熬到臨破曉才回各自的家。如此艱苦的工作，非但沒向劇團索取分文的夜宵補貼，反而自願掏腰包支援劇團的「困難

戶」和演出開支。大伙兒含辛茹苦，共創基業，一心一德，團結如一人。如此的團結友愛和奉獻精神，在當時的社會來說，是極其可貴的。這和杜邊本人的艱苦奮鬥作風是分不開的。例如：杜邊由于趕寫劇本，往往通宵達旦伏案寫作，某夜，他又飢又渴，昏昏沉沉地奮筆疾書，不知不覺地就伏在寫字台上的劇稿上睡去了。到早晨醒來時，却發現滿台面的劇稿都是血，經過一番洗刷之後，也搞不清楚那麼多的血是從哪里流出來的。他也不作檢查，喝杯咖啡，啃兩塊麵包，又繼續寫他的劇本。可以說，他爲馬華劇運的事業所作出的奉獻已臻于嘔心瀝血，鞠躬盡瘁的境地了。因此，我們海鷗人也逐漸從杜邊身上領悟到馬華劇運發展的艱苦歷程。馬來西亞、新加坡相繼獨立建國之後，兩個國家的華人文藝，在馬華文藝獨特性的基礎上欣欣向榮，作爲華人（華族）文藝堂堂正正地登上了新、馬文壇，這是件劃時代的大喜事，怎不教人爲之雀躍歡慶！我們很高興地讀到新加坡方修先生編的《馬華新文學大系》；趙戎先

生編的《新馬華文文學大系》所載的馬華文藝、馬華劇運的許多文章，特別是對《新加坡海鷗劇團》演出活動作了較全面的記載。還有馬來西亞的馬崙先生編的《新馬文壇人物掃描》也在記載杜邊簡歷的同時帶出《新加坡海鷗劇團》的演出活動。還有普洛先生發表在《赤道風》的文章《曾經獻身新、馬戲劇工作的人》在評述杜邊的同時也對《新加坡海鷗劇團》的演出以及戰後的馬華劇運的推動及其作用，作了較全面的介紹和肯定。這對我作爲「海鷗」的成員之一的人，不能不爲之感到欣慰。但更重要的是這許多馬華劇運的歷史篇章，可供今天的新、馬華人文藝、華人劇運的歷史延伸及其發展作參攷，其意義尤其重大。我本人對馬華劇運的歷史在「海鷗」工作期間略知梗概，讀過以上的許多文章之後，得益不淺，對馬華劇運的發展過程，特別是對杜邊與馬華劇運的血緣關係有了更具體、更全面、更深刻的領會。

以上的許多文章，長期與杜邊一起工作的溫剛女士（杜的

伴侶）也曾認真讀過，她還蒐集了許多其他有關杜邊的文藝、戲劇工作的資料，並且加以整理存檔。她曾經是文工團的團員，新中國成立後，她曾先後在上海電影製片廠，珠江電影製片廠的文學部、編輯部任電影文學劇本的編輯、記者，對編輯工作有一定的經驗。因此，我們共商合作寫杜邊在馬華劇運發展過程中所參予創立的幾個劇團的工作歷程。有關《南島劇團》的情況，我所知甚少，由於歲月悠長，連杜邊自己對「南島」的整個工作過程也淡忘了，這時期他所寫的劇本更是蕩然無存。溫剛女士找到當時和杜邊在「南島」一起工作過的戴小郎先生（戴俊英）合作寫了《令人難忘的南島劇團》——「追憶一支華僑抗日救亡劇團的戰鬥歷程」一文。我對曾經和杜邊在《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第四獨立隊司令部宣教團》一起工作過的李小電先生有過交往，他雖然已經六十出頭了，回顧宣教團的活動，還是歷歷在目，憶當年艱苦歲月，不免淚眼涔涔，談到興奮時

又是手午之足蹈之，甚至振喉高唱當年的抗日歌曲。我終於和他及溫剛合作寫《星馬人民武裝抗日時期的抗日劇運》（以「抗日衛馬劇運」會更確切些）——「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第四獨立隊司令部宣教團的戰鬥歷程」。接着我又和溫剛合作寫了《新加坡海鷗劇團》的建立、騰飛、夭折的全過程。以上幾篇文章發表之後，又陸續發現了許多有關杜邊與馬華文藝、馬華劇運的一些評述和其他資料。因此，我們覺得有必要把這些文章和資料編成一個集子。這個集子對目前新加坡、馬來西亞的華人文藝和華人劇運來說，僅從杜邊與歷史上的馬華劇運甘苦與共的角度，已提供了較全面、較真實的參攷資料；同時，這個集子也希望能給予曾經和杜邊一起為馬華劇運出過力、流過汗的劇友們（有的已經作古），（有的已是古稀之年）得以此許慰藉。

以上是有關我和杜邊相處的日子連同《海鷗劇團》的若干生活片斷，以及我對杜邊與馬華劇運水乳交融的緊密關係的一

些膚淺的理解，由此而引起我參予動筆追憶幾個劇團的戰鬥歷程，繼而結集成冊的動機與願望。下面我想就本人所了解的，談談杜邊是怎樣邁開闊步走進馬華劇運的先進行列的過程。

杜邊原籍福建，童年和學生時代是在廈門鼓浪嶼度過的。由於從小親眼目睹洋人和帝國主義的水兵在鼓浪嶼橫行霸道，以及當時中國政府的無能，他潛藏着一顆憤憤不平的童心，無處發泄，後來在進步思想的影响下，他衝出黑暗，追求光明，追求真理。二十歲左右就捲進了十九路軍所建立的福建省人民政府的政治鬭爭浪潮中去。後來他在福建無法立足，即單身隻影逃到舉目無親的新加坡去。初時連最起碼的食宿都無法解決，曾在某建築工地當過雜工，之後得到同鄉人的介紹，到柔佛任教。他從小酷愛戲劇，任教期間，他對當時殖民地統治的不合理現實感到不滿，即動筆寫愛國華工被壓迫的生活與鬥爭的劇本。同時也寫過一些文章發表在《新國民日報》的副刊上。「七七」中國抗戰的砲聲震動了海外華僑的赤子之心，他在當

地愛國青年鄭、蘇、李幾位先生的支持下，建立了宣傳華僑奮起抗日的劇團，後來又得到多方面的愛國團體和愛國人士的鼓勵和支持，爲了更好的配合各地華僑籌賑會的工作以及申領演出執照的方便，即定名爲《南島旅行劇團》，簡稱《南島劇團》。南島劇團被當地政府勒令解散後，他又回到新加坡，繼續和新加坡的華僑愛國青年組織起抗日的團體，並將「南島」的部份伙伴組成「實驗流動劇團」，從事新加坡城郊的抗日宣傳工作。這期間他也寫小說、童話等。發表在郁達夫主編的《星洲日報》副刊上的有《蛇校長》、《獅島夜話》等。一九四二年，日本南侵，他毅然投身馬來亞人民的抗日衛馬武裝鬥爭中去，後來參予建立和領導《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第四獨立隊司令部宣教團》，該團成立後，又日以繼夜，馬不停蹄地爲當時游擊隊的軍民巡迴演出。這期間，他寫的劇本有多幕劇《二年》、獨幕劇《反迫遷》、《她瘋了》等，還有一批活報劇；歌曲有《樹膠花開》、《檳榔女》等，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這個時期的馬華文藝

創作，是在槍林彈雨中摸着石頭過河，探索着新形勢下的創作流向」。然而，時至今日却仍有人說，馬來亞淪陷時期，馬華文藝留下一片空白。這種說法，顯然是違背歷史真實的。普洛先生說得好，他說：「這個時期只要還有抗日的歌聲，就有新、馬華人文學活動的存在，並非萬馬齊喑」。不要說全馬各地游擊戰爭的抗日衛馬文藝、戲劇活動，僅就杜邊所領導的「宣教團」敢於在敵人鼻尖子底下穿梭往來演出，就更具體地說明了日本南侵之後，馬華文藝、馬華劇運的旗幟並沒有倒下，而是由城市轉移到馬來亞人民抗日衛馬戰爭的戰場上，馬華文藝、馬華劇運的鮮明旗幟仍然高高舉起。日本投降後，杜邊又回到新加坡，繼續在新形勢下從事馬華劇運的活動，他首先把新加坡的新舊劇人聯合起來，建立「新華戲劇工作者聯誼會」，簡稱「劇聯」。同時又產生「新華文藝工作者聯誼會」，簡稱「文聯」。在「文聯」、「劇聯」的支持下，一面籌建「海鷗劇團」，一面應全馬各地話劇演出的需求，必須在最短期間內寫出

一批可供演出的劇本來，在劇本奇缺的情況下，他繼《明天的太陽》之後，又出版了《野心家》、《寶星》，還有一批發表在報刊上的劇本，如《老紳士與醉蘇丹》等劇，「新加坡海鷗劇團」成立後，首演《陞官圖》，緊接着教師公會要求與「海鷗」合作演出《萬世師表》，這些戲都是在新加坡維多利亞皇家劇院公演的，執導者杜邊。後來又在「新世界」、「大世界」演了幾場，轟動了當時的新、馬劇壇，普遍得到好評。這些戲的演出，對馬華劇運在戰後的蓬勃發展是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的。

關於邵氏電影製片廠在新加坡拍攝第一部華語電影的過程，有必要在此略談一、二，當時有位中國的名電影導演吳村先生，日侵時期他在印度尼西亞，日本投降後即到邵氏電影廠任導演，他向杜邊提出擬拍攝一部反映馬來亞人民抗日衛馬武裝鬥爭的影片，他知道杜邊曾在馬來亞人民抗日軍工作過，希望杜邊大力協助，杜邊表示樂意全力支持。片名定為《新加坡之歌》。杜邊協助吳村搞劇本。「海鷗劇團」的演職員全力以赴

協助「新」片的拍攝工作。影片的主題歌及片中若干插曲的歌詞都是杜邊創作的。「新加坡之歌」從劇本創作到演員投入，「海鷗」是出了大力的。「海鷗」能為新加坡第一部華語影片盡力，海鷗人是感到自慰的。

「海鷗劇團」一起步就和馬華劇運結下了不解之緣。新加坡各社團、學校的業餘戲劇活動，只要他們需要「海鷗」的協助，「海鷗」則視為己任，不論前后台無條件的投入支援，杜邊也經常抽時間教他們排戲，如當時的華僑中學、中正中學的畢業班聯合演出《結婚進行曲》，「教師公會」與「海鷗」聯合演出的《萬世師表》，平民學校兒童劇團演出《野孩子》都是杜邊執導的。除開《野孩子》不談，這些大型話劇的演出，對促進馬華劇壇的繁榮是無容置疑的。但就劇作的思想傾向及其生活與鬥爭的內容，單從華僑的欣賞角度而言，對祖國官場中的丑態及社會上正與邪的鬥爭等等的認識，顯然是有所啓迪的。然而，面對當時馬來亞廣大人民大眾的生活與鬥爭的現

實，誠然存在着較大的距離。當時馬華文壇對「馬華文藝獨特性」的爭論已經展開了，但能反映馬來亞人民的生活與鬭爭的文藝作品、特別是劇本還不多。我們了解杜邊腦子里又在「摸着石頭過河了」。他經常流露出，在抗日衛馬時期的創作實踐中，隱隱約約地感到「華僑」的地位在抗日衛馬的現實面前已逐漸傾斜到未定型的「華族」的位置上去了。日本投降後，「華族」這個位置越來越顯出人頭湧湧的羣象。杜邊腦海里反復出現華人、印度人、馬來人的羣像，他又在構思反映這些羣像的生活與鬥爭的大型話劇、大型歌舞劇、大型的音樂造型藝術等。於是，表現馬來亞人民迫切願望的大型歌舞，（幾百人合演）在當時的快樂世界體育場上，燈光暗轉、聚光燈的光束隨着情節的發展而變焦的表演出現了；大型的造型表演船夫曲也在這個體育場上出現了；還有大型的電影化話劇《島上夜曲》也在這個體育場出現了。以上這些劇目是「海鷗」與新加坡的青年團體「民聲歌劇社」、「民衆校友會」、「兒童劇團」及工會的劇組聯

合演出的。杜邊任總編導，音樂、舞蹈等則另聘專業人員指導。這些大型的劇目演出之後，的確震動了馬華劇壇、文壇。但也褒貶不一，站在馬來亞人民大眾一邊的，持有一「馬華文藝獨特性」的觀點的人們，都一致認為這是一「馬華文藝獨特性」的創作活動的一次大胆嘗試。馬來亞名作家丘家珍說：《島上夜曲》的內容是表現抗日時代人民的英勇抗日鬥爭的故事，……是革命現實主義的藝術……我們希望這個戲能夠搬到馬來亞內地各埠去演出……我們的確太少表現抗日時代了……我是太興奮了……」。散文作家李真說：「……這幕新型劇的演出，是一九四八年星華劇運的第一聲响炮。「島上夜曲」的公演，將是他們以集體的力量來推動星華劇運向前挺進的更有力的號召……」。但也有些人却說「島上夜曲」，雖然是個新型的戲，但太粗糙了等等。這些大型戲的排練過程是很艱苦的，我曾將我所寫的排練日記發表在當時的「南洋商報」的副刊上，如此大型的戲作電影化的演出，在馬華劇壇上還是首創，在當時的歷史條件

下，要求在藝術上完美無缺，的確非易也。

吉隆坡的「民聲報」著文稱「海鷗」是「暴風雨中的「海鷗」，說杜邊與「海鷗」是爲了推動社會的進步而盡了最大努力作出了貢獻。名作家李潤湖說：「海鷗劇團是文化界的一面鏡子。」

戰後新加坡的華文書店，很難找到戲劇理論的書籍。杜邊爲了「海鷗」本身以及新加坡各社團的劇組的骨干盡快地提高戲劇藝術的理論水平，他往往採取開門排戲，歡迎那些熱愛戲劇又好學的人們到排練現場學習，利用排練休息的時間解答一些問題。有時也召集小型的座談會，對《演員自我修養》一書的若干章節談他的學習心得，讓大夥兒進行探討。他經常說：「我們要不斷地努力學習，提高戲劇藝術的水平，才能更好地爲促進社會的進步而服務……」這也許就是他不畏艱辛、不講代價、勇往直前地獻身於馬華劇運事業的動機吧。

一九四八年，對馬來亞人民的進步事業來說，是個不吉利